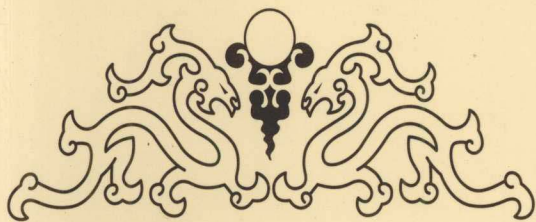


崇文学文库

中国学术史研究

林久贵 周春健 著



本书是中国学术史之史。

对中国古代多部学术史典籍形成的
历史背景、体例特点、主要内容及
学术史批评方法等进行了研究，

辨明了学术史著作产生、发展的源流，
分析、探讨了学术史著作著述体例逐步
完善的历史过程。

崇文
书局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学术文库

中国学术史研究

朱祖延题 

周春健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崇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学术史研究/林久贵, 周春健著. —武汉: 崇文书局,
2008.12

ISBN 978-7-5403-1433-0

I. 中… II. ①林…②周…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
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6905 号

责任编辑: 陈华国

出版发行: 崇文书局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 430070)

印 刷: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37 号 430074)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序

周国林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其他文明古国比较，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绵延不断，源远流长。时光过去了几千年，文字还是古老的方块字，文化传承中最受推崇的还是先秦时期的若干部经典（或许还有汉代的几部书），其间也从未中断。同样确定的事实，是古老的文字和经典并没有束缚后人的手脚，遮蔽后人的视野，而是成为后人生活中交往、交流和思想的基石，千百年中与时俱进，常变常新。说到原因，其实简单。孔夫子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语足以尽之。文字、文献、文化、文明的继承和创新，是多少代人的共同事业，是无数先辈努力的结果。离开人，一切无从谈起。

仅就学术史的发展而言，便有各个时代众多学者为之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才使各个时代学术发展异彩纷呈，薪火相传。因此，学术史研究的关注重点，是学人学派，是他们的著述和思想，是学术演进的历程和传承传播。研究范围如此广泛，这就需要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站在前辈肩膀上来审视几千年的学术发展史。林久贵、周春健二位先生的《中国学术史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就是这样一部专题性的学术论著。

对于过往的学术成就，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学者加以清理，加以总结，成为后继者的一杆标尺。《研究》选取的探讨对象，正是这些标志性的总结性著述。拜读之后，有三点深刻

的印象：

一是所选人物与典籍代表性强。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之学，《研究》以《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等五篇学术史论为基础，讨论数百年间的学术变迁，认为五篇史论完成了中国学术史的早期建构。秦汉以降至唐代的学术发展，则以正史《儒林传》及《别录》、《七略》等目录学著作来反映，着重于汉唐学术史的主要载体体式。宋代以下，则依次选取《伊洛渊源录》、《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等学术名著，作为某一类学术体裁的代表，并间接反映一代学人特质和特殊贡献。近代的学术转型，则选取章太炎和梁启超为代表，具体论述，有充分的说服力。

二是对所选人物与典籍的评价恰如其分。典籍如两部“学案”，《研究》从清初的时代特点、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浙东史学的个性特征诸方面考察《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而推求其编纂宗旨，揭示其体例特点和文献价值，既高度评价其宏观把握、客观求实的学术批评方法，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二书中门户之见、资料繁琐等不足之处。人物如梁启超，是二十世纪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匠，《研究》对梁氏从《新民说》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以及几部清学史名著的解读中，展现梁氏在中国古代学术的终结与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内容翔实，论证有力，对把握现代学术发展脉络提供了明晰的线索。

三是若干具体论述中的考索工夫细腻。像汉唐目录学著作，推其源头，追溯至《周易·序卦传》；排列汉人目录之书，明确指出不始于刘向；尤其是梳理汉唐一千年间的目录学著作，篇幅不太长，却头绪清楚。探讨《伊洛渊源录》的产生，则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僧人传记、灯录体著述，以及这些著述对儒学发展的影响和启示。对于《伊洛渊源录》的编纂过程和内容，更是

做了不少辨正工作。最为有趣的，是对近代分属今、古文经学营垒的章太炎和梁启超，考察他们的交往过程，从其分分合合中透露出宝贵的学术信息。这是作者显示功力之处。

《研究》的关注重点是历代学术史论及学术史的承载体式，这有助于专题探讨的深入，因而有上述几种长处。自然，因体例及篇幅的原因，也有其局限性。像学术与思想、学术与社会的关系，书中未能展开论述；商周时代（所谓“轴心时代”及“前轴心时代”）的学术发展，涉及的不多；汉代以后的学术史撰作，线条勾勒还不够丰满。这些，是可以提升之处。林、周二位先生现供职于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受所内前辈学者朱祖延先生精深的国学素养熏陶颇深，多年从事学术史研究，已经具备相当扎实的基础，并有了可观的收获。二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相信一定会不满足于现有成果，沉潜书卷，持之以恒，不久便能在“学术史之史”的探索上拿出更加完满、更加精审的著述来。

2008年10月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序	周国林 (1)
导 论	(1)
一、“学术”与“思想”	(1)
二、学术史与学术史之史	(8)
三、中国学术史的主要特征	(12)
四、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17)
第一章 中国学术史的早期建构	(23)
一、春秋战国诸子学说的兴起	(23)
二、五篇学术史论：先秦诸子学术的成功总结	(25)
三、五篇学术史论：早期学术史研究基本体系 的建构	(30)
四、早期学术史论的评价及其影响	(48)
五、早期学术史论的其他篇章	(52)
第二章 汉唐正史《儒林传》及目录著作的学术史特性 ...	(57)
一、正史《儒林传》、目录著作：由汉至唐学术史的主 要承载体式	(57)
二、汉唐正史《儒林传》的学术史特性	(64)
三、汉唐目录著作的学术史特性	(80)
四、简短的余论	(100)

第三章 传统学术史著作的发端之作

- 《伊洛渊源录》…………… (103)
- 一、从《高僧传》、《景德传灯录》到《伊洛渊源录》…………… (103)
- 二、《伊洛渊源录》的编纂与成书…………… (108)
- 三、《伊洛渊源录》的内容与取材…………… (123)
- 四、《伊洛渊源录》与学案体…………… (140)
- 五、《伊洛渊源录》的价值与影响…………… (149)
- 六、《伊洛渊源录》“新增”及“续录”…………… (152)

第四章 “学案体”的集大成之作

- 《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 (158)
- 一、《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产生的文化背景…………… (159)
- 二、黄宗羲、全祖望的学术思想与《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编纂宗旨…………… (174)
- 三、《明儒学案》的主要内容及《宋元学案》的成书经过…………… (188)
- 四、《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的体例特点…………… (209)
- 五、《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的文献价值…………… (216)
- 六、《宋元学案》的学术史批评方法…………… (225)
- 七、《明儒学案》与《宋元学案》的不足…………… (234)

第五章 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型

- 章太炎、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 (238)
- 一、章太炎、梁启超与晚清学术界…………… (238)
- 二、章太炎与《馥书·清儒》…………… (249)
- 三、从《新民说》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

势》	(255)
四、清学史的经典名著：《清代学术概论》与《中国 近三百年学术史》	(270)
五、章、梁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现代转型	(292)
主要参考文献	(302)
后记	(309)

导 论

- 一、“学术”与“思想”
- 二、学术史与学术史之史
- 三、中国学术史的主要特征
- 四、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意义

一、“学术”与“思想”

上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推动了学界对文化及文化史的研究；90 年代兴起的学术热，推动了学界对学术及学术史的探讨。特别是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现”话语的传开，一场关于“思想与学术之关系”的讨论开展得如火如荼、旷日持久。2001 年《学术月刊》第 10 期载有《思想的原创性与学术的规范性》“学术笔谈”，2002 年 1 月 18 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熊铁基教授组织召开了“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学术讨论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若不加深思，学术与思想的区别本来是至为明显的，可一经讨论，倒使人对“学术”与“思想”的此疆彼域觉得模糊起来。

我们的老祖宗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这一相对的命题：“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学者认为，这是从“积累与原创”

的角度对“学术”与“思想”关系的最早论证。^①因此，他同意许苏民先生对“学术”所作的定义，即“学术”是指“学问”、“知识”，^②而“思想”则是排斥在“学术”之外的所有较高层次的人类精神活动。它的特征主要在于它的原创性。所以，学问家不是思想家。

在分析了“学术”与“思想”的区别后，学者们更强调了学术与思想的联系——它们两者之间的本质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如果思想是原创，那么学术又是什么？难道学术仅仅是单纯的复制吗？比如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是思想典范，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又算什么？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究竟属于学术还是属于思想？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属于思想还是学术？牟宗三的《从陆象山到刘戴山》是学术还是思想？因此，到头来“学术”和“思想”界限的划定仍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在真正的学术研究中必定会含有原创性的因素；而真正的思想创造也绝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臆想。……也就是说，真正的思想不可能是完全无学术的；真正的学术也不可能是完全无思想的”^③。

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先生也认为，思想与学术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④。葛兆光先生也说：“我相信学术与思想有一定的分别，特别是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不同的分野，……但是，必须说明我并不相信离开知识性的学术，思想可以独立存在，也不相信

①倪梁康《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及如何对立》，《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②参见《开放时代》1999年7、8月号许苏民文。

③倪梁康《学术与思想：是否对立及如何对立》，《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④《思想中的学术与学术性的思想》，《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没有思想，而学术可以确立知识的秩序。”^①熊铁基教授认为，一般的学术，主要是指学术思想史，讲学术史，也就是讲学术思想史，学术的核心应该是思想。^②

强调“思想”与“学术”有别的学者则说，“思想与学术是两样东西，并非一物”，“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学术可以是一种职业，思想则不是”，“学术与思想的一个外在区别，如果从大学建制来看，我以为是学术有系，而思想无系”，“系者，系统也，学术分系，是要求一个人系统地掌握他所研究的这门学科的知识”，“思想史是把思想作为一个学术对象来研究的”。“你把思想与学术视为两途，难道学术就不要思想、也没有思想了吗？非也。……学术当然要思想，也有思想，但那是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是专业思想，而非人们通常所说的那种外在于任何专业的思想。……比如，当年水木清华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他们各自在国学、文学、史学、语言学领域内，哪一个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但你能因此而称他们为思想家吗？反过来的例子是鲁迅，就以上四个领域而言，鲁迅在学术思想上的造诣分别不如他们（王国维似除外），但谁又能说鲁迅不是思想家？”^③

由于对“学术”和“思想”的此疆彼域难以截然划清，所以人们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认识亦显模糊。胡文生在《梁启超、钱穆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一文中说：“在整个 20 世纪甚至今天的学术界，学术史、思想史、哲学史之间的关系一直纠缠不清。作为一门分支学科，它们应当有着明确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5～26 页。

②刘玲娣《中国传统学术及其特点——“中国传统学术特点”学术座谈会综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③邵建《学术非思想及思想泛学术》，《学术月刊》2001 年第 10 期。

的学科界限，但由于这三者在研究对象上的重叠，因此要把它们完全剥离开来就显得十分困难，于是在实践中出现了三者互相取代的情况。”^①虽然多数学者都承认“学术史可以说是知识层面的学术之史，而思想史则是思想层面的学术之史”^②，但针对具体对象时，又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普遍认为学案体著作是真正的“为学作史”（梁启超），而有学者则说：“学案体应该看作是现代思想史的直接源头，而非现代学术史的直接源头。”^③故治学术史者认为《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史记·论六家要旨》是早期学术史论，《伊洛渊源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是地道的学术史著作；但治思想史者则以为，这些篇章和著作是“思想史论著和资料汇编”^④。还有综合说。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认为：“思想家大多注重思考时代的状况、个人的精神世界，学问家则主要是对于知识体系的研究，对分门别类的知识系统、概念范畴的解读。思想学术史，就是要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历史上的思想如何通过学术表达出来，以学术研究的变化，体现思想变迁。”^⑤这一派是主张从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的角度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

正因为当今学人对“学术”与“思想”、“学术史”与“思想史”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本书对此也不想作法官断案式的判定，只对“学术”一词的含义作一简单阐述，以期明了“学术”的内涵及“学术史”的任务。

①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②周国栋《两种不同的学术史范式——梁启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比较》，《史学月刊》2000年第4期。

③同上。

④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原序》，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2页。

⑤宋玉波《〈中国思想学术史〉研讨会综述》，《华夏文化》2002年第3期。

众所周知,“学术”一词,现在是一个复合结构,但在先秦及秦汉时期,“学”和“术”常分开使用,或将“学术”用其他词汇表述。如“道术”,《庄子·天下篇》“道术将为天下裂”,贾谊的《新书》专门有“道术篇”。他们将“道”看作是宇宙、社会、人生的“本”、“体”,而“术”则是“末”、“用”。再如“道器”,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①即学人经常强调的“即器以明道”这一学术思想的根本特征。明末清初,“学术”一词已广泛应用于学人的著述中,因为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使当时学人普遍得出一种结论,即“天下兴亡在人心,人心良莠在学术;要拯救天下、拯救人心,必须辨明学术”^②。故陕西大儒李颙说:“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③

到底什么是“学术”?1911年,梁启超写了篇文章,叫《学与术》,对“学术”作了最为明晰而通俗易懂的解说。他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学与术之区分及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④严复在他的译著《原

①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1版,第132页。

②史革新《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③引自全祖望《二曲先生空石文》,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234页。

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五下,中华书局,1989年3月第1版,第12页。

富》中有按语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这里又是用“知行”的关系表述“学术”，与梁启超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现当代的一些学者如蔡尚思、梁漱溟、钱穆、曹聚仁等对此均有相关论述。

当然，我们现在是把“学术”当作一个整体看待，重在“学”而不在“术”。所以，《辞源》、《辞海》释“学术”为：有系统而较专门的学问。学术应包括现今所有各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但却不应包括这些科学在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应用，即学术的应用已不在学术的范围之内。例如，先秦法家学派的思想是一种学术思想，但运用这种思想的商鞅变法和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已不再属于学术活动。^①熊铁基先生给“学术”所作定义说：“学术是知识与技能（或者技术）的理论升华，学术是各种学问的系统化，学术属于上层文化、精英文化，处于指导地位。有学术就有学术思想，思想是学术的核心，在中国古代这个核心就是道。”^②

实际上，在对学术的研究中，确实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强调“学”，认为以“学”为根本的学术，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学术思想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甚至说，学术的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陈寅恪）。由此而强调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像王国维、陈寅恪即是典型代表。王国维早就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

①参见张国刚等《中国学术史·导论》，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第1版，第4页。

②熊铁基《试论中国传统学术的综合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而治学问”，“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夫清学派因能成为学者，其在我国文化史上有价值以此。”王国维还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

而治学术者也有另外一派，即强调“学术”的“术”，把治学术当作一种手段，要以学术的研究为现实服务。这一派也言之成理，因为，脱离现实的任何研究，是没有生存价值的。我国古代早就有“学术经世”、“经世致用”，即强调学术要为现实服务。如清初的“实学”思潮，即强调学术的“经世”功能，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因身有亡国之痛，认为明所以亡，是因为明末学术空疏，人们只会高谈阔论，而不进行一些结合社会实际的研究，所以明朝灭亡了。这就是明末清初所谓的“学术亡国”论。

实际上，学术的求真与致用之间，既有其内在价值统一的一面，也有其冲突的一面。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和学术研究的总体方面，求真与致用是保持一致的，“学术的‘独立’，可以是与政治的某种疏离，但不是与社会的隔绝，可以是直接参与政治，但只是心怀人文理想的士人对世界、对社会独特的理解和介入方式”^①；当然，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求真与致用之间的矛盾又凸显出来，中西学术界无不被这一矛盾所困扰。怎样在“求真”与“致用”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是每一个学人都苦苦思索的问题。胡文生在《梁启超、钱穆同名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

^①刘筱红《张舜徽与清代学术史研究》之《内容提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史》之比较》一文中说：

学术的本质在求真，但如果它过于忽视自己经世的责任则与社会的发展相脱节，最终损害学术自身的发展。但如果学术在经世之路上走得过远而损害了自己的求真精神，那么学术就会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丧失学术的独立品格。^①

这应该是学人们的共识。不管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学术的研究应当遵循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在学术之“真”、之“实”的基础上来求学术之“用”，不能强调学术的“用”而失去学术之“真”、之“实”。曾几何时，中国学界就过分强调了学术的“用”，导致学术偏离自身发展的正轨。近几年学界刮起的浮躁之风，同样是过分求“用”的表现。

二、学术史与学术史之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史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热点，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史著作，而且有几部通贯古今、卷帙浩繁的大著，尤其引人注目。如李学勤先生主编的11卷本《中国学术史》“采用勾画轮廓、选择重点的方式，以叙说各历史时期学术发展的大势为主”^②，而张国刚等撰著的《中国学术史》对学术史研究的对象及内容作了明确的定义：

^①载《中州学刊》2005年第1期。

^②李学勤主编《中国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起陆续出版，该书共计11卷：《先秦卷》（上、下），《两汉卷》，《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上、下），《隋唐五代卷》，《宋元卷》（上、下），《明代卷》，《清代卷》（上、下）。